

理论视点

2016 年第 4 期 总第 20 期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编印

2016 年 5 月



西安石油大学
新闻客户端



西安石油大学
官方微信

目 录

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1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7
对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理论思考.....	13
应对西方“网络自由” 必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18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及路径选择.....	24
我们该怎样办大学.....	28
锐词(20).....	33
推荐书目(18).....	34

报送：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研究室，
省委统战部六处。

抄送：校领导。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主送：各学院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系），
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各民主党派。

党委宣传（统战）部

2016年5月7日 印发90份

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邓纯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许多党的建设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点。

一、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打铁还需自身硬”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党的十四大写进了党章。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党员干部的管理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松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习近平同志在当选党的总书记之初，就鲜明地表达出从严管党治党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首先必须把自身建设好，自身要过硬。自身过硬，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要过硬。2013年6月，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他进一步警醒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习近平同志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狠抓党的建设，真正把从严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严格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制度面前没有例外；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理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等等。

在此基础上，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把管党治党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涵盖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体现了党的建设

系统性、整体性。它既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坚持正确方向，凝聚起强大合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深刻忧思，充分彰显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无畏勇气和坚强决心。

二、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工作

世界上的政党无论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都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模式。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在思想上确保正确的方向。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建设要有灵魂，指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离不开党的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我们党的建设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一般性地强调执政党规律，就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党的建设实际的。

搞好思想建设这一灵魂工作，首先要坚持共产党人应有的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总开关”问题。习近平同志将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不可能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个真理，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铭记。”

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方面，始终强调“永不动摇信仰”这条底线。“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强调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始终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

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这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此外，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全党、全社会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严厉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忽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他向全党提出要坚持“两个巩固”，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他还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容许以“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借口，放任错误思想的滋生蔓延。

三、强调要以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为导向，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显著成效取信于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对事关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绝不遮掩、绝不回避、绝不含糊。为此，他始终强调抓好党的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分析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党风廉政问题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突破口，进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2014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一方面，以采取一系列硬举措为突破口狠抓党的作风建设。习近平同志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主持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将其作为改进全党作风的第一步。事实证明，“八项规定”开启了新风，为我们党自身改革赢得了时间和动力。2013年6月，又在全党开展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聚焦于“四风”问题，抓住了要害，深刻改变了干部队伍的行为方式。2014年3月，习近平同志又提出了“三严三

实”的要求，这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再启程、再出发。另一方面，以惩治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扎实开展巡视工作，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查处案件涉及党政军等各个领域，做到了反腐败无死角。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超过100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多名，前政治局委员3名。

四、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要勇于改革创新

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将毛泽东首创的我们党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他强调全体党员都要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精神境界、思想作风，解决好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问题。无论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还是当前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体现了这一要求。

要继承并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习近平同志号召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他强调，学习的全在于运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在坚持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强调首要的是牢固树立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立场。他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带头，并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在参加河北省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党性，不能把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要求，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如，在组织建设上，提出新时期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作风建设上，阐明新时期作风建设的时代内涵就是为民、务实、清廉；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倡廉关键在经常抓、长期抓；在制度建设上，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等。

五、强调自律和他律的结合，并将其成熟做法上升到制度层面

党员素质的提高和组织战斗力的增强，要靠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

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建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来武装自己，提升自律的品质。习近平同志强调，自律，首先要把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好，让领导干部发挥好带头和示范作用，提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对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五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改进调查研究、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厉行勤俭节约等。习近平同志率先垂范，到基层考察轻车简从、深入务实，展现了亲民为民、节俭务实的优良作风，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强调要用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党的规矩管好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内外监督，加强他律的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制度建设方面，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如，提出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切不能“牛栏关猫”，强调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要紧一点；制度执行要有刚性要求，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

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观念，严格执行制度，不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习近平同志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党的建设制度除了包括党内制度外，还涉及处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关系的一些制度，特别是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6年1月在全党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些举措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党的建设在制度层面上的把握更加清晰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健全民主集中制一贯是我们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

（摘自2016年第8期《红旗文稿》）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陈殿林 田慧萍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党中央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导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党员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甚至于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危害党的权威，动摇党的执政地位。目前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核心在于找准并解决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从近年监督执纪结果来看，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和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可以说找得精准，切中要害，抓住了根本。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是前提、基础，做是目的。全体党员要在学深做实上下功夫做文章，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作

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

二、凸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指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关键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这和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重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引导党员进一步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全体党员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自觉地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根植于心底，做人民的勤务员。而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也体现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根植得更扎实、更牢固。因此，“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有助于筑牢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根基。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旨在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目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一项重大部署。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首要任务，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把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落到实处，彰显了全面落

实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价值目标，确保全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三、标示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路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标示了全面从严治党既靠教育，也靠制度的实践路向，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

强调学的内容。“学”为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极少数党员因为并不了解党史国情，忽视党章党规学习，根本不懂得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随意否定领袖人物，甚至妄议中央，丧失一个党员起码应有的党性原则。还有人自以为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满脑子封建迷信，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都不知道，只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满嘴说着马克思主义而已。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全体党员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而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着重解决的是全体党员的思想认识和规矩意识问题。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标明了党的纲领、宗旨，规定了党员的基本义务和权利，每个党员必须牢记、尊崇、遵守和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在全党树立起党规党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每个党员要认真学习党规，牢固树立制度和规矩意识，克服思想深处的“潜规则”作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每个党员只有深刻领会，才能与时俱进，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突出学的措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面、贵在经常、着力教育的实践要求。从教育形式

看，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担当起学习教育的主体责任，采取围绕专题学习讨论、创新方式讲党课、召开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作贡献、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表率等多样形式，既实事求是谈问题，又联系实际讲对策。从教育对象看，要充分考虑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农村城市的迥异，又注意到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的不同要求，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搞一刀切。从教育方法看，既要因材施教，分类指导，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调动全体党员学习积极性。从教育频度看，不能一阵风，而要进行经常性教育，从根本上解决党员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明确学的目的。“做”为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开展“两学一做”，根本目的就是使党员干部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合格党员。此次学习教育明确了合格党员的标准，这就是：要看自己在新任务新考验面前，能否坚守共产党人信仰信念宗旨，能否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能否努力追求高尚道德、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能否自觉做到党规党纪面前知敬畏守规矩，能否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积极为党的事业担当作为。这些标准着眼于实际，从小处入手，涉及方方面面，真切自然，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的路径。

四、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多样的形式、活泼的教育内容展现其丰富性，以全体党员为教育对象展现其广泛性，以注重实效展现其深刻性，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有力回应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与普通党员无关”等片面说辞，深化了全

面从严治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本质定向。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在全面从严治党路径上更加清晰。思想建设一直居于党的建设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寻找对策，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思想又要靠制度，二者缺一不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用制度管理、用教育引导等方式规范党员，同时发力、同向发力，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搞严一阵子松一阵子，使每个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时刻明确自己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结合“三严三实”活动的开展，通过层层抓管理，事事抓落实，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动上做一个懂“规矩”的党员，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特征、组织活动的重要内容、提高战斗力的重要途径，把握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有些人认为掌握公权力的党的领导干部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对象，普通党员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极端错误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明确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这是符合党内政治生态客观规律的。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党的领导干部来自于普通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党员，做党员如果都不合格，遑论去做领导干部？而且，党的领导干部都经过党的多年培养，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的状况与整个党内政治生态、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因此，对全体党员提出明确要求，打牢组织建设的根基，对腐败防患于未然十分必要。因此，领导干部在“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中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与党员一起学习讨论、一起查摆解决问题、一起接受教育、一起参加党员民主评议。普通党员也要严格要求自己，提升个人素养，而决不能以为自己没有公权力就可以不接受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重在落实、贵在经常的内在要求。党的作风建设需要全体党员积极投身实践。作风是党员行为方式的体现，体现在日常的一言一行。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注重引导党员时刻铭记党员身份，积极为党工作。要结合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实际，组织引导党员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农村、社区，重点落实党员设岗定责和承诺践诺制度；在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重点落实党员示范岗和党员责任区制度；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重点落实党员挂牌上岗、亮明身份制度；在机关事业单位，促进党员模范履行岗位职责，落实党员到社区报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在学校，重点要求党员增强党的意识，自觉爱党护党为党，敬业修德，奉献社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地生根，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摘自求是网）

对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理论思考

朱 彤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大背景下，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转型已成为很多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多重目标约束下当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以利未来我国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

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

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能居于首位。大体上，我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9.72亿吨油当量，相当于德国的9.6倍、日本的6.5倍、英国的15.8倍。

二是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相比之下，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占比极高，2014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66%，全球仅次于南非（70.6%），是世界平均水平（30%）的两倍多；而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份额仅为5.6%，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3.7%。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亿吨，居全球第一。2000年至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7.6%。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尽管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2009年至2014年排放年均增速为4%），但要从目前的正增长下降到零增长，仅有十五六年的时间。总之，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我国的能源

转型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影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推进的首要障碍

上述“四难”当然会增加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但这并不是影响我国能源转型正确推进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际操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的倾向。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简单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但实际上，巨额补贴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之重。例如，德国成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模范生”的同时，付出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据有关学者估计，仅2013年，德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直接补贴就达到180亿欧元。2013年，德国环境部部长曾表示，如果不收缩项目规模，德国的“绿色革命”在未来20年成本将达到1万亿欧元（不包括已经花费的几千亿欧元）。西门子公司估算到2050年能源转型政策的直接成本将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50年GDP总和的2.5%。因而不久前国内产业界掀起了一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否负担得起高昂补贴的争论。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德国目前能源转型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太高而导致的。事实上，目前风力资源条件良好的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足以与化石燃料电厂展开竞争。而在考虑化石能源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当然，目前全球尚没有一个国家建立基于“完全成本”的电力交易市场，但这表明风电和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技术和

成本基础。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最早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30多年，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目前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只有2%多一点。然而，实践中，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成为推动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理由，拖延转型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缺乏对能源转型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导致简单化理解能源转型，进而造成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实践战略思维缺位、政策应对抓不住主要矛盾，从而导致“头疼医头”甚至“头疼医脚”的重要原因。

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转型的前提

简而言之，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如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是，“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从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出发，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绝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变化。也就是说，与

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德国可再生能源十多年来的快速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政府政策强力支持外，法律强制电网企业为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进行变革至关重要。可见，把能源体系变革作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要求，才能准确和客观地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确方式与真实空间。

其次，每次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随着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崛起，部分煤炭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倒闭。随着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确把握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者受到“旧能源”集团的游说，有可能会出台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发热量更高的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征收煤炭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结果这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与足够重视。从能源转型的历史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当前的能源转型，主要内容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相比，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均更胜一筹。

从长期性看，作为替代能源主力军的可再生能源，无论是能量密度还是利用成本，与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均无优势。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

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对此，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

（摘自2015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

应对西方“网络自由”必须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张卫良 何秋娟

网上空间也是国家的安全空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加快构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这一讲话对实施我国网络安全战略工程提供了基本遵循和重要指导。

在网络安全中，意识形态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没有国家政治制度安全。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网络自由”之名，大肆输出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诋毁、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形成极大冲击。应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必须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打造网络强国。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的“网络自由”是侵犯别国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

“网络自由”的本质是网络霸权主义。关于网络空间主权的适应性问题，一直存在争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先进科学技术，主张“先占者主权”，即“网络自由”。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因而网络自由只能是西方国家的自由，而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当然，西方国家并不是不承认网络主权的存在，只是在网络主权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在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宣示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屡次借各种理由对中国等进行指责和提出维权要求；而在无关自身权益的时候，就高调地抛出“网络自由”论调，宣称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不受限制。这种双重标准就使其网络霸权主义的实质暴露无遗。自从2013年美国情报部门雇员斯诺登出走爆料以来，美国利用网络技术侵犯他国的行径就不再是秘密，美国国务院对此事件也并不避讳，而且还极力辩护，并借机对其他国家进行指责。特别是2015年上半年

以来，美国持续热炒所谓“中国黑客对美发动网络攻击”，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国防部长也曾明确表示，“网络攻击已成为美国遏制某些敌国的重要手段”。可见，美国这个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叫嚣最大声的国家，其实却是对世界各国进行间谍活动最猖狂、对别国网络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网络自由”只是其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主义的幌子。

主张“网络自由”的目的在于借助网络推行意识形态战略。互联网时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其意识形态战略的重点放在网络空间，借助网络向其他国家大肆推行其价值观。为达成这一目的，西方国家就必然要极力维护其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于是就抛出了“网络自由”主张。

“网络自由”说到底就是西方国家为实施意识形态输出战略排除障碍而定制的概念，其目的决不是促进各国网络自由平等发展，而是为西方意识形态战略在网络空间的推行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二、网络主权的国际公认性使得“网络自由”无以立足、不攻自破

网络主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客观事实。首先，网络主权的存在具有客观逻辑。信息时代，网络空间虽然是虚拟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已发展出了包括网络经济领域、网络政治领域、网络文化领域以及网络社交领域等完整的网络生态体系，各国都在加紧建设网络服务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空间的客观存在就决定了网络主权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其次，网络主权的存在具有现实的物质支撑。任何一个空间，只要存在价值和利益，就必然会引起纷争，而有纷争则就意味着存在所属权的问题。在网络化的今天，各国的利益诉求越来越集中于网络空间，导致网络空间硝烟四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甚至开始策划“互联网大战”。因此，网络空间必然存在网络疆界，有疆域自然也就必然有国防，网络边疆和网络国防就是网络主权存在的物质支撑。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行使网络主权，网络主权的客观存在已成为国际共识。再次，网络主权的存在具有法理上的依据。早在2003年，由联合国提议召开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就对“制定与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属于一国主权范围”有了明确说法。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尊重网络主权，不搞网络霸权”的主张，更是得到与会各国的一致认同。所以，网络主权不仅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而且还具有明确的法理依据，是各国发展网络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

“网络自由”缺乏理论支撑和事实依据。首先，网络主权是网络自由的前提，没有限制的自由只是谎言，只不过是强权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普遍主张绝对自由，并且以西方的自由尺度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指责社会主义国家限制自由、干涉人权。网络空间只有限定各国自由的范围，才能保障各国自由发展的同时不侵犯别国的权益。当前国际网络社会之所以存在诸多网络争端，与西方国家网络霸权主义行径密切相关。网络霸权主义导致的一系列网络摩擦事件无不说明，没有主权，自由就是妄言。其次，西方国家的主张和行为自相矛盾。西方国家一方面倡导“网络自由”，另一方面无论是不断通过加大网络科研经费的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来筑牢网络国防，还是采取监视、监听以及网络制裁行为，其实正是承认网络主权的存在和网络主权对于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行为。因此，西方国家“网络自由”主张的虚假性不攻自破。

三、西方国家的“网络自由”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的现实威胁

虽然我国一直强调网络主权，谴责美国的网络侵权行为，并大力加强网络国防建设，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网络技术相对落后，依然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随着网络技术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已逐渐平民化和世俗化，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已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议题或政治精英的政治议题，而是逐渐成为广大普通网民的生活议题，波及和影响到了更广泛的人群。

意识形态安全挑战一个最直接的表现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在我国网络空间的传播和煽动，严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阵地的话语权。国内一些网民多年浸淫互联网，深受西方所兜售的那套“普世价值”所迷惑，逢中必反，逢美必捧，高举“言论自由”旗

帜，大肆攻击和抹黑政府、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习惯性地归因于体制、制度，在网络空间极力散布悲观论调，鼓动消极情绪。国内个别学者沦为西方民主政治的追随者与信奉者，在网络上公开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行宪政民主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敌对势力栽培和收买的所谓“公知”“大V”、网络写手等极端反体制分子长期在网络空间兴风作浪，试图搅浑网络舆论场，搞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判断。一些网络媒体淡化甚至故意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肆传播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尽宣扬奢侈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西方媒体更是精心设置议题、恶意炒作，操控舆论，助推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网络空间扩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影响力，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侵蚀，严重危害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网络舆论的乱象和意识形态的不利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强化互联网管理作出重要指示，国家互联网主管部门、各级宣传部、主流媒体一同发力、积极作为，打响了一场网络意识形态反击战，网络空间变得晴朗了许多。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互联网的治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具有长期性、艰巨性，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日都不可懈怠马虎。

四、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既加强技术防卫力量，又强化“心防力量”

严正申明网络主权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网络主权”原则的践行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西方以“网络自由”之名所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把握我国网络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就必须敢于理直气壮地谈网络主权，把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线。特别是主流媒

体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网络主权，在新闻报道、评论尤其是对外宣传中要表达维护网络主权、捍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定态度，并对商业网络媒体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要引导商业网络媒体端正利益观，摒弃唯点击率、唯收视率为尊的做法，对屡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触犯规定、挑战底线者，要作出硬性处理。

打造网络强国。我国网民数量之众、网络空间之大、网络发展之复杂性等都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但是我国网络发展大而不强。在网络基础设施，尤其是在网络软件设备和网络核心技术等方面还都受制于人，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也是我们在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还受制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因素。因此，维护我国网络安全，就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强化对网络硬件设施的控制权，着重提升网络软件技术水平，加强网络核心技术的科研和开发，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只有掌握了网络核心技术，才能从网络大国变成网络强国，才能有力量、有手段筑牢我国的网防，从而有效地将各种有害言论、错误思潮拦截在我国网络疆域之外，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这其中必然包括网络领域。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加强网络法治建设是巩固我国网络疆域防线，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入侵的强制性保障措施。网络法治建设要在完善和巩固现有网络法律体系的同时，根据发展需要不断更新网络法律体系；坚持重点立法，以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为核心，切实维护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和网络信息传播的双重安全；坚持开放立法，增加我国网络法律法规的适应性，适应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互联网发展的需要；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既要加强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建设，又要加强各级、各层次规章制度的协同性建设等。只有形成健全完善、操作性强、适应性好、不断与时俱进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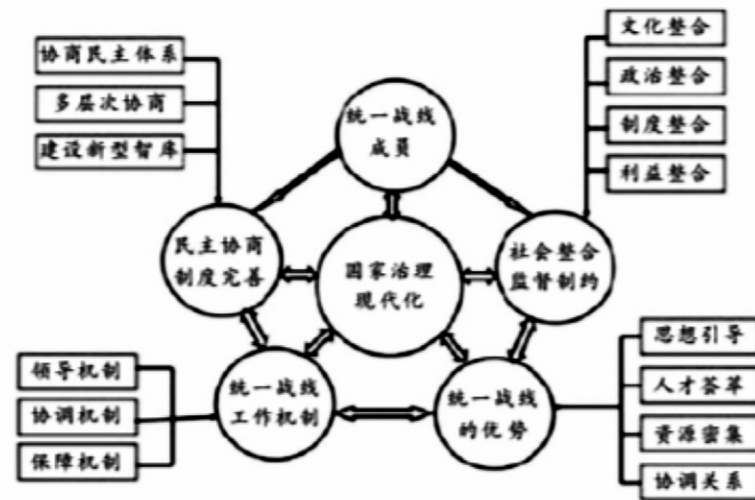
法律体系，不断推进网络建设的法制化进程，才能用法律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打击各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恶性入侵。

大力培育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和对错误思潮的“免疫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维护网络安全是全社会共同责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网民共同参与，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纵观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争端事件，可以看到，仅仅依靠技术升级来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还远远不够。现阶段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提升网络技术水平以抗衡美国等西方网络强国的入侵，另一方面，必须强化“心防”力量，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战略的网络攻势。要看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外部入侵最终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国内商业网络媒体以及持极端化倾向的新闻媒体和自媒体来发挥作用的，我国网防的裂口是在外部腐蚀性的意识形态攻击和内部缺乏主权意识的网络媒体、自媒体的双重作用之下才撕开的。为此，需要大力培育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和“免疫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国内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并改进和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使广大网民受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从而在思想深处认同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党的领导，自觉抵制错误思想、不良言论的侵害，并与之开展斗争，成为捍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一支常备力量。

（摘自2016年第9期《红旗文稿》）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及路径选择

曹胜 杜裕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可以简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结合我国实际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治国理政的最新成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历来是党和国家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以贯之地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因而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具备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应该也完全能够为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出贡献。”笔者认为，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四大优势。

一是思想引导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了统一战线的性质，提出统一战线是“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进一步巩固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

作为劳动者、建设者、爱国者的同盟，具有天然的思想引导的政治优势。

二是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了十二类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这些统战对象包含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等许多新的组成人员，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可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三是资源密集的资源优势。统一战线具有资源密集、联系广泛的资源优势，成功地把社会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党和国家与社会组织可以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切实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四是协调关系的沟通优势。统一战线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要求，科学把握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呼应不同群体利益诉求，引导广大成员顺应时代潮流，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做出努力。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民主协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参与协商民主建设已经成为统一战线履行职能和使命的题中之义。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民主协商。统一战线参加民主协商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统一战线开展民主协商的主要内容为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国家战略层面的进行民主协商的重要决策，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社会整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新阶段，统一战线具有巨大的一致

性、鲜明的多样性、空前的广泛性、宽阔的包容性和显著的社会性等五个特征，是协调各方利益、克服社会离散、促进社会有机整合、形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整合路径包括：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政治整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成文化整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制度整合，用充分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公正机制完成利益整合。同时，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是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把握、科学分析、统筹兼顾、正确处理。

制度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等各领域治理以及国家、区域乃至全球治理中的多层次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统一战线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民主协商等多种渠道，不断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监督制约。监督制约是统一战线在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过程中，实现对国家治理体系完善和执行力的有效监督，旨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统一战线民主监督的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修订、完善情况；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国家治理体系运行、完善情况、国家治理体系执行情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清廉情况，等等。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模型探索

通过理论分析，探索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模式，凝练出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模型：统一战线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核心，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等三个机制，团结凝聚统

一战线成员，发挥“思想引导、人才荟萃、资源密集、协调关系”四大优势，通过“民主协商、社会整合、制度完善、监督制约”四大路径，促进统一战线全面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

（摘自2016年4月2日《光明日报》）

我们该怎样办大学

张尧学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总书记的这段话，点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

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受苏联模式影响，这种模式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同时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延安模式；改革开放后，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现在我们谈及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来源于美国。因而出现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进一

步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在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中国的北大”“中国的清华”而不是“中国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种价值期望。正如有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体系、治理创新都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们说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是考虑到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内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为其社会和国家贡献了一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是符合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流”的内核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上，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谓的现代，更多的是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是，我们喜欢支离破碎地、断章取义地去学习和模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们必须看到，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它更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论的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带领下亦步亦趋，模仿或照搬，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相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是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指挥棒，其本质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导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现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而中国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多年前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学术是“两头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再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外国期刊，现在还要加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美其名曰镀金，实则是学术打工；然后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评价体系下，适应国家时代发展需要、彰显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学应当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学都是服务于其体制的，都必须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承担本国发展的使命，这既是大学教育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必须扎根的土壤，也是或隐或显的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职责与使命。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担当，必然需要深入和系统思考，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从小的角度说，事关建设怎样的大学、培育怎样的人才，从大的角度说，事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当前，一些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人士，虽然或多或少地感知到高等教育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部分大学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思，或者拿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例如，增加大学语文课程、降低英语比重、推广国学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等等，但是，这些反思和举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观象”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思维，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的、全盘的、系统的思考。也就是说，过多思考达成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技术，忽视对整体高等

教育价值观和指挥棒的思考，还未找到统揽全局的“牛鼻子”。

实际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强，将零碎化的思考和布局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因而，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思考，打破仅仅关注大学教育这个“教育尾巴”的末端思维、打破局促于部分领域的工具思维，推进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大讨论、大反思，进而获得教育改革的共性思维，才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获得更具前瞻性、使命性和责任感的、有机衔接的价值体系及其政策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问题与整个教育管理体制紧密相关。时至今日，中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投入以及大学办学水平，都有了一个质的提高，不少大学和学科已经跻身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现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和标准，大多缺乏中国本土的标准和话语权，因而，在专业化教育西化和价值观教育中国化之间存在一个难以调和的张力。在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有了一个质的提高的基础上，我们是时候需要考虑高等教育评价标准的中国要素了。只有当专业教育、知识教育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趋向高度相关，才能培育我们自己的人才，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一流大学。我们有必要反思，是不是国外的发表标准就一定是世界标准？是不是英文文章就一定代表有水平？能够在外国版面发表的论文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我们能不能在评价标准上注入中国要素？吸收西化评价标准的合理之处与中国本土标准相结合，进而推动“不唯西方、兼具特色、服务中国、链接世界”的、自信而不盲从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调整中国教育指挥棒，并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培育既接中国地气、又有世界眼光的人才。

高等教育的价值观选择起于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经中观层面的制度政策调整传输，最终在微观层面的高校办学单位进行落实。具体到大学，除了基本的育人价值体系相同以外，也不能一套评价标准、一套办学理念包打天下，要根据不同的办学历史、办学条件，进行差异化的选择，给予

学生可以选择的余地。同时，对于落实国家教育政策的基层高校而言，最重要的是在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发挥知识分子的主体功能，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在育人理念上与育人过程中形成全员育人、专业育人和立德树人的结合，从办学理念、办学思路、办学体系到学科设立、专业开设、课程设置、教材体系、科研管理等均须做中国价值和中国特色合一的系统设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标准的绝对排斥，恰恰相反，在此过程需要合理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做到有选择性的吸纳；更重要的是要高度契合并服务于中国特色价值体系与育人使命，从而做到办学理念“中国之灵”与办学体制“中国之肉”的高度统一。

（摘自2016年5月3日《光明日报》）

锐词（20）

工匠精神

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这种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将这种精神融入生产产品的每一个环节，就能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瓦釜效应

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义。指在新闻报道中，许多很有意义的新闻题材往往默默无闻，而那些无意义的新闻却煊赫一时。如在“两会”报道中，各大媒体不追代表只追名人、不顾议政只顾娱乐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许多严肃话题无人问津、学者专家无人理睬。这折射出传媒的时代之病，是必须反对的新闻风气。

特朗普现象

2016年美国大选候选人特朗普口无遮拦、政策激进、毫无从政经验，但却在初选中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此次选举最大的黑马。这种现象集中反映了民众“反建制派”观点以及推崇“本土主义”、“反智主义”等价值取向，凸显了美国主流价值的迷失。

沉锚效应

心理学名词，指人们在对其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沉锚效应普遍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一印象和先入为主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树懒体

在电影《疯狂动物城》中，树懒是全片最大的笑点，迅速成为网红。树懒表情迟缓、说话慢，以至于在微博和朋友圈也开始流行起“树懒体”。也就是把一句完整的话每隔一个或者两个字就要用句号隔开，降低阅读速度，让别人听起来感觉很好玩。

推荐书目（18）

《大国崛起》

朱东来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内容介绍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性大国文明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如何从历史上主要大国的灿烂文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如何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这些都已经成为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本书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通过解读15世纪以来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追踪和研究世界性大国兴起轨迹，总结大国崛起的个性特征和基本规律，探索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中国发展寻找镜鉴，为民族复兴发掘动力。